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青年学术文库

真与意义的元语义学研究

周志荣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青|年|学|术|文|库

真与意义的元语义学研究

周志荣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真与意义的元语义学研究 / 周志荣著. —北京: 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1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青年学术文库)

ISBN 978 - 7 - 5161 - 5494 - 6

I. ①真… II. ①周… III. ①语义学 IV. ①H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14767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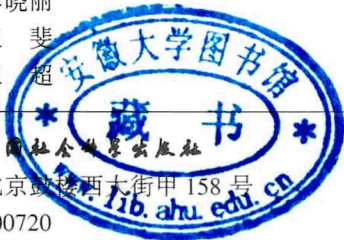
选题策划 田 文

责任编辑 任 明

特约编辑 李晓丽

责任校对 王 斐

责任印制 王 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1.25

插 页 2

字 数 355 千字

定 价 5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受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出版基金资助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青年学术文库》 编辑委员会

主 任：吴汉东

副主任：郭道扬 张中华 陈小君

委 员：刘可风 卢现祥 熊胜绪 杨灿明

范忠信 罗 飞 朱新蓉 陈池波

齐文远 张新国 夏成才 姚 莉

杨宗辉 朱延福 向书坚

主 编：张中华

编辑部成员：姚 莉 陈敦贤 刘普生 朱冬生

本书主审：朱书刚

总 序

一个没有思想活动和缺乏学术氛围的大学校园，哪怕它在物质上再美丽、再现代，在精神上也是荒凉和贫瘠的。欧洲历史上最早的大学就是源于学术。大学与学术的关联不仅体现在字面上，更重要的是，思想与学术，可谓大学的生命力与活力之源。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是一所学术气氛浓郁的财经政法类高等学府。范文澜、嵇文甫、潘梓年、马哲民等一代学术宗师播撒的学术火种，五十多年来一代代薪火相传。世纪之交，在合并组建新校而揭开学校发展新的历史篇章的时候，学校确立了“学术兴校，科研强校”的发展战略。这不仅是对学校五十多年学术文化与学术传统的历史性传承，而且是谱写 21 世纪学校发展新篇章的战略性手笔。

“学术兴校，科研强校”的“兴”与“强”，是奋斗目标，更是奋斗过程。我们是目的论与过程论的统一论者。我们将对宏伟目标的追求过程寓于脚踏实地的奋斗过程之中。由学校斥资资助出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青年学术文库》，就是学校采取的具体举措之一。

本文库的指导思想或学术旨趣，首先在于推出学术精品。通过资助出版学术精品，形成精品学术成果的园地，培育精品意识和精品氛围，以提高学术成果的质量和水平，为繁荣国家财经、政法、管理以及人文科学研究，解决党和国家面临的重大经济、社会问题，作出我校应有的贡献。其次，培养学术队伍，特别是通过对一批处在“成长期”的中青年学术骨干的成果予以资助推出，促进学术梯队的建设，提高学术队伍的实力与水平。再次，培育学术特色。通过资助出版在学术思想、学术方法以及学术见解等方面有独到和创新之处的科研成果，培育科研特色，以形成有我校特色的学术流派与学术思想体系。因此，本文库重点面向中青年，重点面

向精品，重点面向原创性学术专著。

春华秋实。让我们共同来精心耕种文库这块学术园地，让学术果实挂满枝头，让思想之花满园飘香。



2009 年 10 月

Preface

A university campus, if it holds no intellectual activities or possesses no academic atmosphere, no matter how physically beautiful or modern it is, it would be spiritually desolate and barren. In fact, the earliest historical European universities started from academic lear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 university and the academic learning cannot just be interpreted literally, but more importantly, it should be set on the ideas and academic learning which are the so-called sources of the energy and vitality of all universities.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is a high education institution which enjoys rich academic atmosphere. Having the academic germs seeded by such great masters as Fanwenlan, Jiwenfu, Panzinian and Mazhemin, generations of scholars and students in this university have been sharing the favorable academic atmosphere and making their own contributions to it, especially during the past fifty – five years. As a resul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new century when a new historical new page is turned over with the combination of Zhongn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and Zhongnan University of Politics and Law, the newly established university has set its developing strategy as “Making the University Prosperous with academic learning; Strengthening the University with scientific research”, which is not only a historical inheritance of more than fifty years of academic culture and tradition, but also a strategic decision which is to lift our university onto a higher developing stage in the 21st century.

Our ultimate goal is to make the university prosperous and strong, even through our struggling process, in a greater sense. We tend to unify the destination and the process as to combine the pursuing process of our magnificent goal with the practical struggling process. The youth's Academic Library of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funded by the university, is one of our specific

measures.

The guideline or academic theme of this Library lies first at promoting the publishing of selected academic works. By funding them, an academic garden with high – quality fruits can come into being. We should also make great efforts to form the awareness and atmosphere of selected works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standard of our academic productions, so as to make our own contributions in developing such fields as finance, economics, politics, law and literate humanity, as well as in working out solutions for major economic and social problems facing our country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Secondly, our aim is to form some academic teams, especially through funding the publishing of works of the middle – aged and young academic cadreman, to boost the construction of academic teams and enhance the strength and standard of our academic groups. Thirdly, we aim at making a specific academic field of our university. By funding those academic fruits which have some original or innovative points in their ideas, methods and views, we expect to engender our own characteristic in scientific research. Our final goal is to form an academic school and establish an academic idea system of our university through our efforts. Thus, this Library makes great emphases particularly on the middle – aged and young people, selected works, and original academic monographs.

Sowing seeds in the spring will lead to a prospective harvest in the autumn. Thus, let us get together to cultivate this academic garden and make it be opulent with academic fruits and intellectual flowers.

Wu Handong

关于真、意义与逻辑的对话

周志荣（以下简称“周”）：王老师，您好，我有本书要出版了。这本书主要是关于意义问题的，是在我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形成的。您比较了解我的博士论文，而且您对这本书的主题，也就是“真与意义”，也很熟悉，是这方面的专家。所以，我很冒昧地请您为我的这本新书写一个序。

王路（以下简称“王”）：你的书稿我看过了，觉得很不错。你让我写序，让我有些为难。我不认为老师就一定可以为学生作序，老师的序就一定会为学生的书增色。一本书的序应该是关于一本书的，因此是它很重要的一部分，应该认真而慎重地对待。提个建议好吗？！与你这本书相关，你看有些什么问题，我们一起讨论一下，这样对你的书，对读者可能会有所帮助。比如，我就有一个问题：你的书探讨真与意义，书名中的“元语义学”是什么意思呢？

周：好吧，那我就围绕这本书的主题向您再请教几个问题吧。首先我解释一下这本书标题的意思。我博士论文的题目是《真之条件的意义理论研究》，主旨在于探讨真与意义在解释上的先后关系。最近这两年我在不断修改原来的并增加一些讨论的时候，我渐渐发现原有标题容易引起混淆，因为国外已有专门的《真之条件的语义学》的著作，是在戴维森的基础上，借助塔斯基的真之理论构造关于其他各种类型自然语言语句的真之条件。相比之下，其实我讨论的东西并不是戴维森的意义理论或者任何其他意义理论（有的也称语义学，例如证明论的语义学或推理论的语义学）的延续，我没打算在语义学的一些基本原则的指导下借助一些逻辑分析的技术去解决部分自然语言语句的意义问题。所以这本书不是语义学的著作，但它确实讨论了语义学的很多核心问题，例如，“真概念对于构造一

种意义理论有什么样的作用”，“以戴维森的意义理论为例，真概念在这种意义理论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非真之理论的意义理论是否能满足组合性原则？”此外，我还论证了，反实在论者和紧缩论者基于不同的真观念对戴维森的意义理论提出了批评，但这些批评是否成立都取决于真概念在意义理论中的作用。这些问题和论点显然不是某种具体的语义学的研究对象，它们与语义学的研究处于不同的层次，它们以意义理论或语义学本身作为讨论的对象。为了突出这一点，避免误会，我想用“元语义学”这样的词是比较恰当的。我查了一下，国外也有“meta-semantics”这样的使用，但不多，不过这也没有关系，我只需要在导言中对这个词专门做一下解释应该能够让大家知道我在干什么。

我在这本书中的目的是要讨论真概念与意义概念以及真之问题和意义问题之间的关系。我对于这个论题感兴趣是因为在读博的时候受到您的影响，起初对真之理论感兴趣，在接触戴维森和达米特的理论之后又对意义理论感兴趣。这些年来，您一直强调真概念是西方哲学的核心概念，例如，在《“是”与“真”——形而上学的基石》（2003）中，您说：“哲学家的工作是求真”，“把真作为主要的核心概念凸显出来，乃是哲学的发展和进步”。这种立场一直贯彻到“涵义与意谓——理解弗雷格”（2004）、“意义理论”（2006）、“从‘是’到‘真’——西方哲学的一个根本性变化”（2008）在这些文章中，您认为，真在语言哲学中同样也是核心概念，甚至真概念也是意义理论的核心。然而，在诸多意义理论（语义学）中，并不是所有意义理论都是以真概念为中心，而至少达米特、后期维特根斯坦、紧缩论者（例如霍维奇、菲尔德）主张应该以其他概念为基础来解释意义。他们认为意义概念比真概念更为基础。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待这些人的意义观？

王：你的问题很大，涉及的面比较宽。后期维特根斯坦除外，你提到的其他人都是围绕真来探讨问题的。但情况不一样。紧缩论的出发点是批评戴维森的真语句，他们认为，戴维森的句子模式赋予真以太大的作用，而真本身没有那么大作用。所以它们要紧缩真的作用，乃至取消真在解释意义中的作用。真与意义对应，真与意义的讨论结合在一起，是20世纪以来语言哲学讨论的一个共识。紧缩论强调意义为先，并不意味着不讨论真，不涉及真。

达米特的情况则更为复杂。他的意义理论无疑是以真为核心的，因为

他明确说过，一个意义理论包括一个关于所指（reference）的理论，它的外壳是一个关于涵义的理论；这两部分构成了意义理论的核心。此外它还有一个部分，这就是关于力量（force）的理论。句子有真假，但是说出的句子还有各种各样的力量，比如断定句有断定力，疑问句有疑问力，等等。这三部分一起构成了意义理论。很明显，这种意义理论是基于弗雷格关于意谓（Bedeutung）的理论。其核心概念当然是真。但是在涉及逻辑、涉及真这个概念的时候，达米特还有许多不同的讨论。比如，他批评戴维森的真句子模式不是一种完全的意义理论，因为它预设了对一部分语言的理解。他不接受排中律，他提出的对句子要有正当性说明（justification）的观点，等等，往往超出真假二值讨论的范围，甚至也不预设真这个概念，这与他的直觉主义逻辑背景相关。但是达米特从来没有放弃真这个概念，他明确指出，离开真这个概念，许多逻辑性质无法讨论，也无法辩护。晚年他有一本小书《思想与实在》，他说，如果上帝有逻辑的话，那么一定是三值的。这一观点无疑与他一辈子的直觉主义逻辑观点相关，但是你能说与真无关吗？

周：我同意，真概念确实是西方哲学的核心概念，它始终是哲学家们关注的中心。不过我有个想法，那就是，西方哲学的核心概念并不只有真一个，意义大概也是一个核心。只不过我现在没有确实的证据，仅仅是感觉而已。与您的看法不同的是，我认为真概念并不是意义概念的核心。这也是这本书要论证的观点。这并不否认真概念的重要性，而是说，在构造意义理论的时候并不需要用到它。由于它们的重要性，哲学家们总是将真与意义结合起来说。

王：你陈述的情况大致不错。我分几步来回答吧。首先，西方哲学中有许多核心概念，这个说法是不错的。比如知性（understanding）、因（果）性（causality）、先天、先验、必然、可能，等等，当然，还有近年来我所讨论的是（being）这个概念。因此，真并不是唯一的核心理念，这样说也是不错的。我强调真，主要在于真这个概念始终占有一个重要的位置。比如亚里士多德一方面说，有一门科学，它研究是本身，另一方面又说，把哲学看作关于真的知识是恰当的，这就几乎把真与是放在同等的位置。而他关于真的讨论也是特别多的，尤其是结合是来讨论真，或者结合真来讨论是，这样的地方非常多。在其他人的著作会有一些差异，但是不谈真的几乎没有。随便举一个例子，比如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这无

疑是哲学著作不是逻辑著作吧，似乎 being 也不会不是它的核心概念吧。但是，它在序中一开始就谈论真，不仅谈到各种不同的真，特别还谈论了哲学的真的实质和方法，等等。中文有多种翻译，如“真理”、“真相”、“真假”等等，含糊了“真”这个概念本身，读外文却是可以看得非常清楚的。即使从中文字面上进行思考，是不是也应该思考一下，这些概念是不是与真相关，为什么与真相关呢？

其次，你说意义理论中意义是一个核心概念，这当然是不错的。问题在于，当我说，真是一个核心概念的时候，我只是指人们通过真这个概念来认识意义，并且通过真这个概念获得关于意义的认识。这一点，不仅弗雷格是这样，戴维森是这样，达米特也是这样的。霍维奇等人不同意这种看法，这很正常。他们在讨论中突出意义本身，也不是不可以。问题在于他们对真这个概念有些什么讨论，对弗雷格到戴维森等人的思想作出什么样的批评和反驳，因为他们要紧缩真，就不可能不讨论真，而只讨论意义，或者赤裸裸地讨论意义。最保守地说，他们不可能对迄今为止围绕真来讨论意义所取得的成果不闻不问，弃之不顾吧。

再次，你说真不是意义理论的核心概念，构造意义理论可以不要真这个概念。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两人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我们也讨论过多次了。我认为你能够坚持自己的看法是好的，能够不断深入思考，并为自己的看法提供文本支持和证明也是好的。但是我还是不大赞同这种看法。“核心”是一个比喻，不过是指重要，离不开的意思。今天的意义理论不可能离开现有的成果，另起炉灶。这一点是共识。因此，真是它的核心概念已是一个事情。具体就真与意义这两个概念来说，你说不依靠真来讨论和认识意义，总要提供一种方法吧。我一直认为，弗雷格提供了一种非常好的方式来回答这个问题。这就是利用真（意谓）来探讨思想（涵义或意义）。举例来说，我们俩这些日子一直在进行讨论，写了那么多东西，我们都理解它们。那么，我们理解的是什么呢？当然是这些文字的意义，而不是它们的真。所以，意谓（Bedeutung）和涵义（Sinn）是两个不同的层面，真在前一个层面，意义在后一个层面，通过真来探讨意义是可行的。现在，不用真来探讨意义不是不可以，问题在于，你用什么来探讨？作出什么样的探讨？顺便说一下，今天有许多人不满意弗雷格关于意谓的探讨，而想对他说的涵义作进一步的探讨。比如，把组合原则应用到关于涵义的探讨上。这样的工作是不是能够说明涵义，我是非常怀疑的。即使可

以，实际上这也是用弗雷格的方法来探讨，因而依然是依赖于真。

周：您提到达米特，我的理解也有所不同。达米特在《什么是意义理论Ⅱ》中的确探讨了一种以真之理论为核心的意义理论，但他的目的不是要为这种意义理论辩护而是进行批评，进而提出他自己的证实主义的意义理论（verificationist theory of meaning）。他的批评也是建立在三值逻辑和反实在论的基础上，虽然我认为达米特对戴维森的批评很有问题，但我同意他的意义观念，我在书中也给出了论证。语句的意义可以独立于真而得到解释，但正如你所说，语句的意义总是要与语句的真放在一起讨论。这是弗雷格的哲学传统。不过，另外有一些哲学家，例如 Searle 和 Grice，他们讨论意义的方式与此大有不同。他们将意义还原为言语行为或说话者的意图。这就意味着在他们的理论中，语言始终是与具体的使用相联系的。我认为，这些东西对于语言表达思想而言并不重要，而且与语句的真假也没有关系，这大概也是弗雷格很少谈到这些东西的原因。不知道我的这种看法对不对？

王：达米特在早期理论中使用了“verification”这个词，受到许多批评，后来他改用“justification”这个词。辛提卡教授曾经对我说过，这依然没有解决问题。实际上，他的这一理论也确实受到质疑。“verification”这个词是早期逻辑实证主义者的用语，意思是“证实”，其拉丁词根与真相关。“justification”这个词的词根是“justify”，字面意思是使某物成为正当的（或说明某物是正当的），我曾经说过，一些英文名词与动词的翻译无法对应，比较难译，这个名词即是其中之一。有人采用台湾译语“证成”，我觉得不合适。它没有“证”的意思，“成”也比较含糊，因为“just”的意思是明确的。达米特不承认排中律，拒绝二值原则，并不意味着他拒绝真这个概念。他强调以弗雷格的理论为核心，但是还不够，因为弗雷格的理论是基于二值原则的，但是在语言表达中，还有其他情况，比如三值的情况、没有真假的情况等等，所以他提出不预设二值，探讨语言表达的力量。前一点从直觉主义逻辑出发很容易理解，后一点其实也很容易理解，因为二值考虑是外延的，而考虑表达力量，就涉及内涵语境。二值原则当然是要出问题的。但是，这绝不意味着他不考虑真，甚至拒绝真。

Searle 和 Grice 讨论意义的方式确实不太一样，至少与弗雷格非常不一样。主要是因为他们没有从真出发，没有围绕真来考虑意义。关于意义的

讨论是非常多的，中世纪的讨论很多，近代也不少，比如洛克就讨论过字词的意义，20 世纪 30 年代有一本书叫 *The Meaning of Meaning* 就是专门讨论意义的。但是弗雷格的工作改变了关于意义的研究方式，或者说开创了一种新的意义研究方式，一如戴维森所说，是弗雷格使我们知道有这样一种研究意义的方式。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在一些古典研究中，“意义”也作为重要概念出现，比如 2001 年出的 *Aristotle's Theory of Language and Meaning*，我读过这本书，有意思的是其中一章专门讲真。这样的研究给人以启示：由于有关于真与意义的认识，因此人们可以从这样的角度来进行研究；同时，如果古代没有相关理论，这样的研究大概不会有意义。

周：是的。我从一些二手资料中得知亚里士多德以及斯多噶学派对于意义也有探讨。意义问题在中世纪哲学中也是重要问题。这方面我没有深入的研究，但这使得我意识到意义问题可能不是直到 20 世纪语言哲学产生之后才摆在哲学家们面前的一个哲学问题。您刚才的意思是说，在弗雷格之前，哲学家们也谈论意义，但讨论的方式不是弗雷格的这种方式，是吗？这会不会与背后的逻辑不同有关？

王：这里有两方面的问题，其一，是不是重视和讨论意义问题；其二，如何讨论意义问题。比如亚里士多德讨论“是”，他说，说是者就是真的，说是者不是就是假的。这是不是与意义相关，是不是关于意义的讨论？又比如他的范畴理论，一个谓词表述的可分为实体、质、量、关系等等，这是不是关于意义的讨论？再比如中世纪的指代理论。这个理论所探讨的是：句子中的词项所表达的东西究竟是什么。谈论方式不同，但是它是不是关于意义的讨论？弗雷格的贡献是不仅探讨句子的意义，而且指出并提供了一种谈论的方式，这就是他说的：“‘真’这个词为逻辑指引方向。”这使人们认识到，真与意义相关，可以通过真来讨论意义。因此，戴维森假定真这个概念是明确的，因而我们可以用它来解释意义。当然，这些讨论也反映出背后理论背景的不同，或者逻辑理论的不同。

周：这倒使我想到 20 世纪产生的另外一种语义学——“证明论语义学（proof-theoretic semantics）”。这两年我沿着达米特的语言哲学和逻辑出发读了些材料，发现有一批逻辑学家坚持直觉主义逻辑的立场（例如，Gentzen, Prawitz, Hetying, Schroeder-Heister, 等等），并在哲学上也坚持与达米特类似的观点，他们在讨论逻辑常项和逻辑后承的时候不是借助真而是借助证明概念，并且认为真概念是由证明概念定义出来。这些逻辑学家

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提出了这种不同于真值语义学的语义学，而且现在也有人试图像戴维森一样，将它用于刻画自然语言的意义。

王：20 世纪逻辑的发展，确实为讨论哲学的基本问题提供了雄厚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成果。弗雷格和塔尔斯基的工作使人们可以在同一个平台上展开自己的工作，这就是一阶逻辑和真之语义学。逻辑可以发展，但是基于弗雷格的逻辑。语义学可以发展，但是不能脱离基于弗雷格逻辑所发展的逻辑，因而不能完全脱离真之语义学。在这些讨论中，有些可以是纯逻辑的，比如你说的这些，真这个概念与证明这个概念之间是什么关系。这些讨论的结果也可以是逻辑的。但是它们无疑也可以应用到其他领域，比如应用到哲学上去，如你所说，探讨自然语言的意义。我认为这里面的问题比较复杂。不管怎样，由于一阶逻辑是基础，真之语义学是基础，因此真这个概念一定是必要而重要的。

周：既然前面提到弗雷格的涵义理论，现在我想问一个具体问题。尽管戴维森赞扬弗雷格为探讨意义提供了方法，但他也提出了两点批评。一是，将意义等于指称无法解释逻辑等值的语句往往不同义；二是，将意义等于指称无法满足组合性要求。我认为戴维森误解了弗雷格的意义理论，他将弗雷格的指称理论当成了他的涵义理论（意义理论）。这可能是因为“意义”一词的翻译问题，您在“弗雷格关于意义和意谓的理论”（1993）谈到过这个问题。就第二点批评而言，尤其是关于弗雷格对涵义的说明，后来有许多讨论，不过您好像讨论得不多。我认为，涵义在弗雷格那里是可以作为意谓的，只不过一个表达式的涵义与意谓总是有所区别，“‘A’的涵义”这个表达的意谓就是“A”的涵义。Schwyder（1967）将弗雷格的涵义的组合性表示为： $\Sigma(A \oplus B) = K(\Sigma(A), \Sigma(B))$ ，意思是说，复合表达式的意义是由构成部分的意义按照一定组合方式构成的。这个表达肯定会将“A”的涵义转化为“‘A’的涵义”的意谓。涵义层面的组合性变成了意谓层面的函数运算。您觉得，Schwyder 的表达符合弗雷格关于涵义的组合性的本意吗？

王：在一些文献中，尤其是近年来，确实可以看到许多关于涵义的探讨。关于弗雷格的意义理论，我确实只讨论意谓，而不怎么讨论涵义。这里面至少有两个层次的问题。一个问题是，弗雷格是不是有关于涵义的讨论？另一个问题是，人们关于涵义的探讨，无论形成什么样的结果，是不是对弗雷格思想的确切解释？也就是说，关于涵义的探讨是一回事，关于

弗雷格思想的探讨是另一回事。区别了这两个层次，就比较容易回答你的问题。

首先，弗雷格没有关于涵义的探讨，说明他不重视或不在意这个问题。那么，在探讨弗雷格思想的时候，我们应该考虑，为什么他会这样？其次，人们对涵义进行探讨，但是这样的探讨可以形成什么样的结果，有什么样的道理，是可以讨论的。但是它们是不是可以解释弗雷格的思想，是不是有助于说明弗雷格的思想，这是另一回事。我不认为这样的探讨会对理解弗雷格的思想有什么帮助。

周：即使弗雷格没有这样的探讨，人们也可以探讨呀。即使对于理解弗雷格有偏差，能够获得一些理论成果也是好的呀。

王：这个问题大概没有那么简单。直观上考虑，弗雷格区别出涵义和意谓，为什么只探讨意谓而不探讨涵义呢？他是故意留下来让后人探讨吗？在我看来，他关于意谓的探讨，其实就是关于涵义的探讨，他通过关于意谓的探讨来说明涵义。比如，他认为，对专名涵义可能会有不同理解，但是只要不改变句子的真值，这种歧义就是可以容忍的。这难道不是通过意谓（真值、对象、概念）而对涵义（思想、思想的一部分）的说明吗？！人们可以不满足于这种说明，而对涵义作进一步的说明。比如把组合原则同样应用于涵义本身，比如你引述的“ $\Sigma(A \oplus B) = K \Sigma((A), \Sigma(B))$ ”。问题在于，这样得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说明呢？它肯定无助于对弗雷格思想的说明。那么它有助于我们关于涵义的认识吗？这就是为什么前面我说，我对这样的工作表示怀疑。

周：弗雷格在“否定”、“思想结构”、“逻辑导论”这些文章中也讨论了思想（涵义）的组合性。他没有使用“函数－主目（function-argument）”这样的术语，而是经常使用“饱和－不饱和（saturated-unsaturated）”来分析涵义，在谈论表达式意谓的时候，他有时候也用“饱和－不饱和”的分析方法。例如，谓词意谓的概念是不饱和的、不完全的、有待补充的，专名意谓的对象是饱和的、完全的。可不可以说，“饱和－不饱和”较之“函数－主目”这种分析是更为基础的分析？我这种提法本身有问题吗？

王：函数－主目，或者我的译法：函数－自变元，是弗雷格讨论的一个基本结构。我这样翻译，一个主要的原因在于，弗雷格那里一般没有 Fx 这样的表达式，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开语句。而只有 Fa 、 $\forall xFx$ ，以及 $A \rightarrow B$